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Zhejiang

20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史

何辉斌 方 凡 邹爱芳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Zhejiang

20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史

何辉斌 方 凡 邹爱芳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史 / 何辉斌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6

(外语·文化·教学论丛)

ISBN 978-7-308-06830-7

I. 20… II. 何… III. 文学研究—外国—20 世纪 IV. I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778 号

20 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史

何辉斌 方 凡 邹爱芳 等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文字编辑 何 瑜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55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830-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以过去为对象的历史值得当今的学者研究吗？冯友兰曾针对钱穆的历史研究说道：“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①也许冯友兰的观点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黑格尔认为，历史上的东西往往是“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在我们的现实以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②。荀子曾说：“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③可见过去和现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知道过去就无法很好地理解现在。有鉴于此，我们认真地探索了20世纪浙江省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希望能够展现浙江学人在这个领域的突出成就，并能对当今学界有点借鉴意义。

在撰写这部外国文学研究史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尽量地回到历史的空间中，试图真正理解过去的成果；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今天，高度关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尽力挖掘更多的现实意义，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就是把过去的事情当作当代史来研究。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两点是很难的。作为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书，我们不敢奢求完全达到既定目标，只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本书是我们分工合作的结晶。本人完成了六章，总结了20世纪浙江省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并且论述了王国维、鲁迅、茅盾、郑振铎和王佐良等五位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方凡撰写了三章，探讨了郁达夫、梁实秋和施蛰存的外国文学的论著；邹爱芳研究了三位学者，他们是朱维之、赵瑞蕻和袁可嘉。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乐明和蔡海燕，她们本来不是这一课题的成员，却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前者撰写了关于梅光迪的那个章节，后者研究的是周作人。虽说集体的力量总是比一个人大，但集体写书也有些不好的地方，大家的观点、文体等都不太一样，难以完全融入一个整体。不过反过来看的话，合作也有好处，毕竟增加了多样性。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184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8页。

③ 《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卷）》，上海书店1996年版，第293页。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大力支持,受到了殷企平教授、范捷平教授等的关心。在出版的过程中,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张琛女士为我们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承担了不少辛苦的劳动。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难免有些不妥之处,希望行家批评指正。

何辉斌

2009 年 4 月于体育场路浙大宿舍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1
一	肩负着救亡的使命	2
二	以启蒙为己任	6
三	自觉地奉行拿来主义	11
四	具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	13
五	集批评家、翻译家和作家于一身	15
六	后半期的新变化	16
第二章	王国维	21
一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24
二	王国维心目中的西方文学	25
三	王国维眼中的西方戏剧	27
四	王国维心中的西方悲剧	30
五	王国维的西方作家小传	32
第三章	鲁迅	39
一	论述了外国文学的重要性	42
二	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	45
三	提出了自觉的方法论	46
四	做出了有特色的研究	48
五	热衷于翻译理论与实践	57
第四章	周作人	62
一	明确的外国文学研究目的	65

二	丰赡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	70
三	翻译理论与实践	76
四	文艺思想中的外国成分	81
五	文学创作中的外国成分	86
第五章 梅光迪		90
一	介绍并推广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	92
二	积极倡导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	94
三	坚持传统文化,批判地引介外国文学理论	96
四	用西方话语方式来阐释中华传统经典著作	99
五	开创“文学”学科,培养外语人才	101
第六章 茅盾		104
一	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性	105
二	进化论的文学观	108
三	神话研究	112
四	自然主义文学研究	115
五	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118
六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120
七	革命文学和新版进化论	121
八	突出的翻译成就	123
九	洋为中用的远大理想	126
十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公式	127
第七章 郁达夫		131
一	严谨的外国文学翻译观	132
二	广泛而深入的外国文学评介	135
三	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文学创作	139
第八章 郑振铎		141
一	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	143
二	文学统一观与《文学大纲》	146
三	翻译理论与实践	151
四	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外国成分	154

五 文学创作中的外国成分	158
第九章 梁实秋	162
一 积极传承西方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	163
二 广泛评介西方文艺理论和作品	167
三 大量译介外国文艺作品	169
四 积极致力于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172
五 有效沟通中西文化	174
第十章 朱维之	176
一 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178
二 文学史研究	186
三 比较文学研究	191
四 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	193
第十一章 施蛰存	196
一 以“求真”原则翻译具有现代性的外国文学作品	197
二 以独到的眼光撰写外国文学评论	200
三 成功创作了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	204
第十二章 王佐良	208
一 自觉的外国文学史观	210
二 卓越的英国文学史研究	216
三 外国文学领域的其他成就	220
四 出色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	222
第十三章 赵瑞蕪	228
一 浪漫主义研究	230
二 比较文学研究	234
三 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	239
第十四章 袁可嘉	242
一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系统研究	245
二 “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研究	251

三 阐释了现代派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256
四 出色的翻译成就	259
参考文献	263

第一章 20 世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浙江省人杰地灵,在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文学史专家严家炎曾说:“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①现代文学教授王嘉良曾说:“有人以为,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势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并非过誉。”^②浙江不仅是文学创作大省,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强省,在这个领域也独占鳌头。文学创作历来很受重视,这方面的论著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同样出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一直被人们冷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展示这个领域的成就。鉴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并认真地进行研究。

浙江省的外国文学专家包括浙江籍的学者和在浙江工作过的学者。从年代上划分,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可以划为第一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者属于第二代,改革开放之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属于第三代。在第一代学者中,我们选择了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梅光迪、施蛰存、梁实秋、郁达夫等九位,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 1949 年前取得的。在第二代学者当中,我们选择了王佐良、袁可嘉、赵瑞蕻、朱维之等四位,他们的学术地位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当然,有能力的学者远不止这些,只是由于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暂时只能研究这些人物。我们没有把第三代学者列入本书的范围之内,并不是因为第三代学者水平不高,而是由于他们还在创造的高峰期,难以作出合理的评价。第一代学者是当时文学界享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巨头,曾经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 年后的学者在外国文学圈内也是顶尖的人物。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总体上谈论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的特点,然后再谈谈新中国成立后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新特点。

① 严家炎:《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王嘉良:《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一 肩负着救亡的使命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捍卫国家主权、消除国内动荡一直是近现代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人们尝试了以科技为核心的救国和以政治变革为核心的救国,但效果都比较有限。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有识之士把重点转向了文化层面的救国。刚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学的是医学,有着科技救国的梦想,但目睹了国人麻木不仁的场面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医学,决定转向文学。他说:“……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应当用怎样的文学来改变国人呢?由于闭关自守而失去生命力的传统文学显然不行。如果把中国的文化史从古代一直读到当代,“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暖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②,所以只能“别求新声于异邦”^③。在危难的关头,异国的新思想成了救国的灵丹妙药。

学习怎样的外国文学呢?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受压迫国家的文学。中国显然属于被压迫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许多学者纷纷转向了弱国的文学。鲁迅曾回忆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④他还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⑤其中俄苏文学最受鲁迅重视,他翻译的俄苏作品约占其总译作的二分之一。

除了鲁迅之外,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的立场也比较类似。茅盾曾说:“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⑥郑振铎认为,“血

①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④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⑤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

⑥ 茅盾:《文学者的新使命》,载《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1页。

和泪的文学,恐将成为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趋向”^①。由于救亡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特别是那些同时会创作的学者,都有明显的左翼思想,自觉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满腔热情地高呼救亡的口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翼”的学者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看,不是无可挑剔。西方强国在文学方面可能值得学习的东西更多,但他们不愿意为之花很多的精力。鲁迅曾这样说:“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②鲁迅救国心切,没有耐心深入研究那些与救亡无直接关系的作品。他还说:“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伽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③俄苏文学对于救亡来说的确重要,但离开了薄伽丘(薄伽契阿)的《十日谈》、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经典著作,世界文学的殿堂就会大为失色,而且受压迫国家的文学的精华也未必都在于反抗和斗争。现在回过头来看部分鲁迅、茅盾等翻译的受压迫民族的文学并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见他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偏颇。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左翼”的作家,虽然口头上说自己以弱国文学为师法,实际上都有较好的西方文学功底和扎实的本国文学修养,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成为简单的口号和宣传,曾成功地创造了一些将反抗精神和艺术性融为一体的上乘之作。

“左翼”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在文学层面上有偏颇的一面,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他们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且满怀激情,主张推翻专制的统治,驱逐外来的侵略者,但对于如何改变和完善自己的文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具体的问题不太重视。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即使取得胜利,未必能够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有时血腥的革命换来的还是残酷的专制,法国大革命、斯大林式的革命等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自己的革命也付出过较大的代价。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霍尔巴赫也对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进行深刻的批评,他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要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

① 郑振铎:《无题》,载《郑振铎全集(第三卷)》,山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斯妥夫斯基的事》,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05页。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文》,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25页。

也不是嗜血性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①主张暴力革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给解放运动带来力量的同时,也给暴力的扩张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以前只谈论他们的积极意义,而对潜在的危险性很少触及。

救国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向西方文学学习。王国维、周作人、梁实秋、梅光迪、施蛰存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他们主张“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通过文学了解强国的方方面面,企图揭开强国之秘密,或介绍强国立国之本,假他们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来教育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以及现代国民意识。”^②这些人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注重经典著作,他们构建的世界文学版图更能体现文学性。

虽说西化派的学者更加重视文学性,但文学和救亡毕竟是两码事,带着明显的救国目的学习西方文学也会走向片面。例如说,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 Irving Babbitt 被当时的学者美名为白璧德,特别受欢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救亡的眼光阅读西方文学,是片面解读西方文学的结果。梅光迪曾说:“几乎是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当时已经面世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我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精神的引导下做些事情;过去二十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无情的批判,造成新旧文化间的差距愈拉愈大。”^③他如此佩服白璧德,虽然有着学理上的原因和个人关系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可能不在于这里,而在于白璧德反对激进的浪漫主义简单地否定传统的东西,而且把孔子看作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重要的思想家。梅氏希望从白璧德的观点中找到救亡的途径,那就是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挖掘真正有价值的要素,并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地加以发展。梅光迪有这种倾向,许多学者,特别是学衡派学者,也有这种救国愿望,所以白璧德成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这种学习是很有意义的,但中立地看有着偏颇之处。和白璧德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批评家有很多,但他们特别看重这一位,显得不够公平。

从理性的角度看,弱国应当向强国学习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从感情的角度来说,这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之所以受欺负,就是由于那些强国横行霸道。而且通过学习强国来自强的过程是缓慢的,似乎无法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正因为这样,这一学派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从理论上讲,通过学习西方文学来自强和通过学习被压迫国家的战斗文学来救亡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的重点毕竟有着很多不同:前者强调向西方学习,

① 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第 58 页。

②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5 页。

③ 梅光迪:《评〈白璧德:人和师〉》,载《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9 页。

以便达到自强的目的,后者注重的是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赶走西方来的侵略者,使自己的国家独立;前者对传统文化持比较肯定的态度,提倡在中西结合之中发展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建设,后者认为传统文化有太多的流毒,基本上应当铲除,以便创造全新的文化;前者突出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学术著作传播思想,后者更依靠情感,主要载体是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前者在学术圈内较有影响,后者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效果。纯粹从理论上讲,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互惠,但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就不可能采取那样的立场;如果他要真正坚持这一立场,就得对其他立场加以否定。起初两派的辩论也许只是学理层面的,但接着必然会有情感成分和个人恩怨介入,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这两派救亡人士不幸地陷入相互攻击的恶战之中。当年的学衡派和激进派的论战首先就是救亡的立场不一样而造成的。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在某个程度上是这种斗争的典型代表。按理说,两者各自有自己的道理,但当年毕竟敌人已经打到了自己的家门之前,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激进派的观点。虽说两者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西化派一度遭到很多批评,而激进派曾受到至高无上的赞扬。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有所变化,人们已经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了。

不同的学派之间产生矛盾是很正常的;就是同一个人,一旦主要观点改变了,也会自相矛盾,以至于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例如说,茅盾早期主要学习西方文学,认为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吸收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优点,是西方文学的一大进步,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之不见恶中有善”。^①但他后来转向了革命文学,对正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现代主义的态度变为完全否定,他说:“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品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脂抹粉的骷髅”^②。就是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世界中,不同的观点都如此难以并存,更何况为不同的人所掌握呢?所以这两派人虽然都有赤子之心,都很爱国,却互相批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肯定激进派,批评西化派,这是不公平的。

救亡是充满激情的事业,往往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甚至献身的精神。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所以遇到了各种危险,如鲁迅、茅盾受到政府的通缉,郁达夫惨遭日本鬼子的杀害。这种为民族的独立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这些学者增添了高

① 茅盾:《〈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载《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② 茅盾:《杂谈文艺现象》,载《茅盾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贵的光环,加固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二 以启蒙为己任

康德曾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可见启蒙的关键在于独立自由地思考,而不是被情感、偏见、利益等所蒙蔽。但中国人往往缺乏为思考而思考的纯粹思辨。王国维曾指出,“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②。这种哲学家由于热心于政治,就会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在某个程度上把思想当作政治的附庸。

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地走上了现代的道路,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却迟迟没有走出封建社会,甚至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有着更加封闭化的倾向,丧失了原先的生命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启蒙显得特别重要。鲁迅曾说:“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也就招致了‘哑’来。”^③可见中国的愚昧状态是自我封闭的直接后果,如果要走出这样的状态,肯定要利用外国文学进行启蒙。

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来启蒙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理想。茅盾曾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故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④所谓的现代思想,主要指中国人所缺少的科学和民主。有了现代的思想,可以“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⑤。鲁迅特别欣赏有主见的人,他说:“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⑥这是鲁迅所推崇的撒旦式的英雄所具有的个性,体现了一种已经启蒙的人格。他高度评价了拜伦的《曼弗列特》的主人公,因为他在绝望和失败之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自信地对魔鬼说:“汝曹绝不能诱惑灭亡我。(中略)我,自坏者也。行矣,魅众!死之手诚加我

①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2 页。

②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载《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③ 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3 页。

④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载《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7 页。

⑤ 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载《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8 页。

⑥ 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 页。

矣,然非汝手也。”^①哪怕落入可耻的下场,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断。鲁迅对这种精神的重视,无疑是想利用这个故事来启蒙,希望国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有自己的主见。

启蒙和救亡往往联系在一起。近现代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才去学习深刻的思考,在有了思考能力之后,就能更好地救国。但光有独立的思考还不行,还得依靠救亡运动来保证思想的自由,救亡往往能够给启蒙以良好的外在保障。如果合理地处理它们的关系,两者可以处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鲁迅、梁实秋、茅盾等大学者都是启蒙和救亡并重的,他们的两个方面常常是相互促进的。

救亡和启蒙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虽说这里所列举的浙江学者都同时重视救亡和启蒙,但各自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救亡,王国维、周作人、梅光迪、施蛰存和梁实秋更重视启蒙。他们的这种区别常常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导致剧烈的笔战。

首先,救亡者和情感与暴力运动联系更加密切,而启蒙者更重视理性和讲道理。郑振铎曾说:“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②启蒙注重的是理性,需要的是不加约束的思考,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反对以暴力解决问题;而救亡是充满热情的事业,主张不惜采用暴力。如果启蒙所讲的道理不利于救亡的事业,或者救亡者的行为阻碍了自由的思考和辩论,两者必然陷入可怕的斗争之中。以启蒙为己任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本不一定要表现反抗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在文学上并不发生艺术的价值,不过在一种相当的时代之中,文学作品便不免要沾染一点反抗的色彩而已,并且有反抗精神的文学又往往发生在实际革命运动之前”^③。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④。也就是说,“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⑤。如果冷静地看待问题,梁实秋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种论述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不利于救亡,主张反抗和救亡的鲁迅看了这样的观点就很不高兴,把他贬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的批评带着不少革命者的激情,不完全是在讲道理。他们的论战虽然可能带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但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立场的不同。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② 郑振铎:《文学与革命》,载《郑振铎全集(第三卷)》,山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③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梁实秋文集(第一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④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梁实秋文集(第一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⑤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梁实秋文集(第一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其次,启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专为救亡服务;救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只为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思考只是启蒙的开端,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什么问题都可以思考,应该像笛卡尔那样争取“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①。启蒙者因此成了完全独立的理性主体,万物都是怀疑和重新思考的对象。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往前思考下去,救亡本身就会成为怀疑(甚至否定)的对象。其他一切价值观,如友谊、爱情、美等,都会成为理性审判的对象,结果甚至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现,在纯粹理性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价值观的藏身之地,他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之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它们之所发生而发生;世界中不存在价值。”^②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还会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崩溃。所以康德曾提醒人们说:“故我发见其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玄学之独断论(即不经先行批判纯粹理性,在玄学中即能坦然进行之成见)乃一切无信仰(此常为异常独断的而与道德相背反者)之根源。”^③可见没有限制的启蒙会以无比锋利的理性之刀把救亡、上帝、善等全部解剖开,甚至全部否定掉。另外一方面,救亡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障思考的自由,而救亡本身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只允许人们往一个方向看问题。如果启蒙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开始独立地思考,触及对救亡不利的问题,诸如敌人的合理的一面、战争的残酷性等,导致救亡者反过来限制启蒙。梁实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编者按,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引发了当时文坛大地震。以启蒙者的眼光看,梁实秋所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以救亡者的眼光看,是十足的大逆不道。真正的启蒙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可一旦触及救亡的禁区,就会遭到声讨,两者必然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

如果启蒙没有充分展开就加以限制,以便给革命让道,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康德曾说:“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④一些弱国,虽然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但有限启蒙的遗留症非常严重。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遇到不少的问题。幸好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补了不少课。

此外,关于学习的对象和内容,启蒙者和救亡者也有一定的区别。启蒙者往往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王国维曾说:“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

①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②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④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页。